

我们的父亲母亲 4

梁凌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父亲母亲. 4 / 梁凌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20-10674-3

I. ①我… II. ①梁…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2324号

WOMEN DE FUQIN MUQIN

我们的父亲母亲 (4)

梁 凌 主编

书名题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陈知建
吴焕姣 薛玉茹
解建华
戴雨虹
舒晓利 林 泉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 × 240mm
16
255千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0674-3
49.8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我们的父亲母亲》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周太安 梁 凌

编委会主任：周太安

编委会副主任：查振国 张建伟 吴 淳

编委会委员：周文谦 王砚春 张继勇

赵冀开 梁 凌

书 名 题 字：陈知建

谨以此书向跟着毛主席浴血奋战，跨过万水千山的父辈们致敬！

他们，从井冈山走来，从大别山走来，从大巴山走来，从雪山草地走来，从宝塔山走来，从太行山吕梁山走来，走进白山黑水，走进昆仑天山，走进天涯海角，走进雪域高原，走进崇山峻岭，走进大漠荒原，他们奠基了共和国，他们化作了戍边卫国的山脉。他们，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仰望他们就是仰望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仰望他们就是仰望共和国旗帜的风采，仰望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目 录
Contents
我们的父亲母亲(4)

王太眉	从安源到延安	001
王晓川	父辈英姿寒梦去，功臣遗老布衣还	027
刘 蓓	我的红军父母	033
萧南溪	如铁纪实万千字，留与后人鉴丹心	049
吴 淳	抗战地下“长城”形成的艰难岁月 ——父亲与地道战	074
杨越鸣	但将“初心”付一生	084
胡志刚	父亲的“荣华富贵”	100
田 竞	夫妻一起上战场，并肩战斗在山东	114
王春茅	黄埔军校、延安抗大、国防大学， 一生与军事教育有缘	125



任 兵	父亲·团队·太行山 ——谨将此文献给英勇的父亲和他英勇的团队 150
何黎辉 何额红	我们的军人母亲 176
洪普丰 洪 霞	忆我们的父亲洪资善 193
杜 京 杜 恺	军旅比翼，鸾凤和鸣 208
史 建	金城明贞 ——父母的家国情怀 225
葛志彬	父辈友情暖我心 238
田 亮	后跋 三代人的传承 247

从安源到延安

◎王太眉

父亲王耀南（1911年—1984年），江西萍乡人。在安源煤矿做童工时参与组建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年儿童组织——安源儿童团，之后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亲历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壮大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工兵部队和领导机关担任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父亲王耀南

父亲王耀南在1922年—1923年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参加了安源铁路煤矿工人大罢工，参与组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年儿童团，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亲历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产生与完善，是红军的第一个工兵连连长，长征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达陕北。父亲经历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转危为安，成长壮大的艰难历程，我把这段历程写出来，希望我辈和我们的后代能够传承红色基因，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组织安源儿童团参加大罢工

我的家乡江西省萍乡市上栗镇是中国鞭炮祖师爷李畋的故居，历朝历代，制造鞭炮烟花的手工作坊比比皆是，高手如云。我们老王家就是其中之一，我家的鞭炮烟花不但销到南昌、长沙、汉口，还远销南洋。我父亲很小就深谙王氏鞭炮原料加工、提纯和鞭炮烟花制造的绝技。

大清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建汉冶萍总公司，在安源开了洋煤矿，我祖父和曾祖去当了爆破工。1919年上栗镇一个鞭炮作坊发生意外爆炸，产生连锁爆炸，大半个镇子夷为平地，幸免于难的父亲和祖母只好沿途讨饭去安源寻找祖父和曾祖。

那时江西、湖南农民迫于生计到安源煤矿做工，煤矿和农村不一样，虽然赚钱不易且非常少，但是可以当天或者至少一个月结算工钱，可解燃眉之急。于是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的煤矿工人有一万多人。满怀希望的农民，进了矿井才知道这里的危险和艰辛，矿工身上三尺布：下井包头布，出井洗澡布，回家遮羞布。“少小进炭棚，老来背竹筒（要饭），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矿工子弟很小就得帮助家里干活赚钱。

安源煤矿有许多煤层很薄，大人进去很难施展，包工头雇用童工钻进去挖煤。我父亲7岁就下井去挖煤。他在我祖父、曾祖的指点下很快就掌握雷管、导火索、硝氨、TNT炸药的使用，以及岩壁爆破技术和巷道掘进的技巧。

我父亲谈到他家制造鞭炮烟花的绝技为他在红军时期应用这些技术打击敌人，屡立战功。他说好多人会造黑火药，但是他们不会使用TNT和硝氨炸药，会用洋炸药的不会使用黑火药，即会使用黑火药和洋炸药的他们打仗不如他，所以他总是胜出。

我父亲说：他参加革命是因为受到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他亲眼看到毛主席到安源考察。1921年秋，毛主席以毛润之的名字，教书先生的身份，身着灰蓝色竹布长衫、脚踏草鞋到安源考察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情况，领导工人运动。他下到矿井看到工人像牛马一样的劳作，赚取难以糊口的工钱，对工人们讲：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咱

们工人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争取咱们工人的权利。我父亲第一次听到有关工人运动的道理。

这年冬，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李立三在安源牛角坡办起平民学校，讲述工人运动的道理。我父亲常常去听课。一天，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为了减少矿井损失，总监工王三胡子命令矿警用沙袋封堵井口。李立三得知后，带领在平民学校学习的工人赶到井口，逼迫王三胡子打开井口，救出了井下的工人。以前遇到这样的矿难，井下的工人必死无疑，我的曾祖就是在这样的矿难中死去的。这件事使我父亲看到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不久，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秘密组织起来，成立“工人俱乐部”。

1922年4月初，我父亲约了张正、刘玉汉等6个非常要好的童工去刘振海家。刘大叔说：俱乐部让童工结一个团，现在就由你们几个先结起来。他说：你们结团要有规矩：这里的事情不要对外人讲，你们结团不能和别人打架。俱乐部交给你们的事情要办好。于是儿童团正式成立了。

儿童团领受的任务是给工人夜校望风。那天蒋先云同志给工人讲课：“资本家的每一块铜板上面都沾着工人的血。”我父亲看到刘工头从远处向学校走来，便和刘玉汉、梁明球、赵古良大声争吵起来。待刘工头走近了，教室里传出蒋先生的教书声。刘工头没探听到消息。

一次，刘振海给我父亲一根小竹竿，说里面藏着一份重要文件，要他迅速送到另一个同志那里。我父亲正走着，突然碰上了工头。我父亲在工人掩护下瞒过工头，把信送到了。

一天，工人们在井下开会。韩工头走来探听消息，被我父亲发现便高声叫：“不要往前走了。”工头低声呵斥道：“不许叫！”张正用更大的声音叫：“小心，前面在装炮。”韩工头举起鞭子就要打他们。听到警报，矿工宋法生走过来用矿工镐挡住工头的鞭子说：“孩子们警告你，防止危险。你怎么不知好歹？”又有两个工人提着矿工镐走过来，韩工头见势头不对，赶紧溜走了。

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公开。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工人万岁”的口号在安源响起来了。

9月11日，我父亲跟我祖父去接头地点接刘少奇同志并给他担任通信和警卫工作。



9月14日凌晨2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当日傍晚，北洋军阀的军队开进矿区，实施戒严。军队占领了工人俱乐部办公楼，工人们想把办公楼夺回来。军队与工人发生了对峙。刘少奇派工人纠察队赶来，命令工人后退，避免冲突。戒严官兵不管小孩，儿童团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把俱乐部的指示传达给工人。

全国支持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声浪越来越大。

9月16日上午，刘少奇到驻公事房的戒严司令部去谈判。刘振海让我父亲带儿童团员告诉工人们去公事房，防止军阀谋害刘代表。几千工人得信，聚到了公事房。谈判在刘少奇的斗争下，取得胜利。之后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我父亲加入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2004年中国少年先锋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新世纪雏鹰集团、长春电影制片厂依据这一史实联合拍摄了电影《安源儿童团》。

二、跟毛委员走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委员在安源策动领导秋收起义。我父亲和60多个技术工人组成工农革命军1师2团爆破队，杨明任队长，我父亲任副队长。起义部队攻打大城市长沙受挫，人员越来越少。他和杨明认为应该召集干部开会，了解大家的想法。

大家都看到形势非常困难。他们谈起加入安源俱乐部，参加大罢工；讲起反动派杀工人代表黄静源，镇压工人的九月惨案；讲起党在九月惨案后又派干部来领导工人运动。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几经失败，都坚持下来了。

就算有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安源工人。我父亲说：“我们安源工人要跟共产党走，跟毛委员走。”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三、走向井冈山三湾改编定纪律

9月29日，爆破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我父亲宣布休息时，挑着炸药走了几天的队员又累又饥又渴，纷纷走到附近农田挖红苕吃；吃饱肚子，脱光衣

服，在池塘里洗起澡来，吓跑了塘边的大姑娘、小媳妇。其他部队看到我父亲的部队吃红苕，也都到地里找红苕吃。毛委员路过看到，非常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

在改编的动员大会上，毛委员宣布：去留自愿。要走的一律发给5块钱路费。他说：“只有上井冈山开辟农村根据地才能坚持革命。”

毛委员把工农革命军1师缩编为1个团2个营，共6个连和团部特务连。爆破队的60多个同志，分散到了各个连队，我父亲被编到1连1班当班长。

毛委员对我父亲说：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没有严明的纪律打不了胜仗。把你们从领导位置上拿下来，是让你们向懂军事的同志好好学习。这里和你们安源煤矿不一样，你们出矿井当众洗澡不奇怪，在农村就不行了。

毛委员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决定：党支部建在连上。他宣布了严格的纪律：

第一，部队的行动要听指挥。

第二，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苕。

第三，洗澡避女人。



1977年，父亲在三湾枫树坪留影



四、开辟根据地井冈山造盐

从1928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进剿，根据地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尤其是食盐。地方党组织设法搞到的土盐又苦又涩实在难咽。

6月底，王良连长命令我父亲的1班和3班跟他到蓉市的新城去取谭震林筹集的食盐。他们接到10担食盐。王连长命令1班护送挑夫挑盐，刘荣辉的3班担任掩护。当王连长带队走到茅坪附近，突然遇到乡丁的截击，王连长指挥3班和乡丁打了起来。我父亲看到敌人从拿山方向来了1个班向王连长的背后抄过去，就命令1班，顶了过去。挑夫听见枪响，扔了挑子逃走了。敌人遇到我父亲的阻击，就向后撤。这时，敌人的大部队到了。王连长命令后撤。他们退到茅坪，朱良才党代表带2排赶来接应。退到山里后，党代表问盐呢？这时我父亲才想起来，他把盐丢了。

回到根据地以后，王连长向军值班员袁文才报告。袁文才一听丢了盐，还死伤了弟兄，就命把王连长绑了。我父亲一看绑了连长，马上说：报告团长，盐是我丢的，要罚就罚我。袁文才呵道：绑了。于是把我父亲也绑了，与王连长一起拖到朱军长那里。

朱军长了解他们取盐的过程后，指责王连长：“没有把主要任务放在第一位；没有强调命令的重要性，没有检查1班长执行命令没有；发现1班长丢了盐，没有考虑补救措施。”然后说：“三令五申，为将之道，你犯了大忌，处罚你，你有什么说的？”王连长说：“没有。”朱军长责打了王连长，然后责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我父亲说：“看到3班受到敌人的威胁，就去支援。”朱军长问：“你去3班，有没有命令？”我父亲回答：“没有。”朱军长说：“没有命令，为什么擅自行动？”我父亲无话可答。朱军长呵道：“不执行命令该当何罪？！”袁文才等呵道：“斩！”朱军长命令：“把王耀南就地正法。”王良不顾挨打的伤疼，跪下来和刘荣辉一起向朱军长求情。袁文才说：“军长，王耀南可是毛委员的人，杀王耀南要跟毛委员说。”朱军长派警卫员萧新槐去请毛委员，然后问我父亲还有什么话说。

我父亲想到他在老家做黑火药提纯毛硝时，会有食盐析出。食盐是毛硝

里面的杂质。土盐苦涩也是因为硝和其他杂质，把土盐里面的硝和杂质提出来，就成食盐了。他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军长，朱军长命令给他松绑。萧新槐把毛委员请来了，我父亲向朱军长和毛委员报告需要菜油和牛皮胶提纯食盐。毛委员予以批准，朱军长让我父亲戴罪立功。

党代表朱良才得知朱军长交代的任务，派司务长杨梅生去把各个连队的土盐取来。在我父亲的指挥下，用小锅把牛皮熬成胶；支起大锅，挑水架火，把土盐化开；用木棍不停地搅拌大锅里的卤液，适时加入菜油，用勺子撇去浮沫，兑入牛皮胶，慢慢地食盐从锅底析出。他命灭火，大家帮他把锅里食盐上面的硝水倒入水桶，取出食盐。

萧新槐用茶缸子舀了一些盐，跑到军部报告。军长接到报告后，问我父亲还有什么本事。我父亲告诉军长：用盐碱土、墙角和茅厕边上的老土也可以提炼硝和食盐，硝可以制造火药。朱军长布置了搜集含碱土、制造食盐和火药的任务。

晚上，我父亲到连部去看连长。感谢他为自己求情，请他原谅自己连累他挨打。连长说：“兄弟，军令大于天呀，违抗不得。今天是你命大，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谁也救不了你。”

我父亲用祖传秘方解决了根据地部队和当地老百姓吃盐的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带我看望萧新槐和刘荣辉叔叔时，他们谈到



父亲（左）与井冈山老战友刘荣辉合影

这段趣闻，都说军令大于天，违抗不得。他们谈到跟随毛主席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不会有朱毛会师，就没有星星之火的燎原。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走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

五、保卫根据地组建工兵连

在井冈山，我父亲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等多次战斗，下山向闽西进军参加了几十次战斗，作战英勇，指挥得当，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特务营副营长。他当排长、连长的时候注意把有技术特长的同志调到自己的排和连。作战的时候他们担任架桥、爆破任务。部队驻训的时候帮助老百姓修缮房屋、家具，改善了军民关系，受到毛委员、朱军长的好评。

1930年3月，军作战科聂鹤亭科长对我父亲和杨明说：“军部决定成立工兵连，要你俩负责。”聂科长让我父亲物色矿工、木匠、铁匠、水手、泥瓦匠到工兵连。

1930年6月上旬，红四军到了福建长汀，扩编成红一军团，朱德总指挥找我父亲交代组建工兵连。朱老总说：工兵在历史上就有，1000多年前就有。工兵



父亲（左）和铁道兵郭延林副政委合影

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你们过去爆破、架桥，就是工兵。

红一军团工兵连正式成立。我父亲当连长，杨明任指导员。为了培养红军工兵骨干，我父亲先后在红军学校，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担任助教、教员、主任教员。

他带领工兵部队参加会昌、赣州、顺昌等战役时，使用坑道爆破对战役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坑道爆破以沙县战役最为成功。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开始第5次“围剿”。红三军团趁“福建事变”的机会东进入闽，将卢兴邦的骑兵旅包围在沙县城内。卢旅凭借沙县城墙据险抵抗，三军团组织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总部令我父亲率总部工兵连到沙县增援。军团参谋长邓萍向我父亲交代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攻打沙县的决心。他们于当晚接近敌人城墙，侦察敌人城墙上的工事。城墙四角各有一座坚固堡垒，东、西两城楼也被敌军改成堡垒，配置有重机枪和大炮，尤以西部火力最强。

在城西北近200米有个水塘，我父亲建议：在这里做坑道口挖掘坑道，爆破西城楼。他计划挖两条平行坑道，一条为主坑道，一条为备用坑道。彭总指挥、杨尚昆政委、邓参谋长亲临勘察后，同意我父亲的建议；决定三军团工兵连再挖一条坑道爆破另一个方向城墙；并令各师工兵配合作业。彭总指挥强调，坑道爆破的成败是这次攻坚的关键。

我父亲带领工兵趁夜幕到达了指定位置。塘坑在坑道开口处没有水，苇草非常茂盛，利于隐蔽。

夜晚，敌人为了防止红军偷袭，在城墙上挂了多盏汽灯，把城楼和城墙照得清清楚楚。为了准确地把坑道挖到敌人城楼脚下，必须掌握好坑道的长度、方向和水平。没有仪器测量距离，我父亲带人，半夜爬到城根下面，用麻绳一段段地量。为了防止出差错，往返量几次，测量时差点被敌人发现。

坑道掘进水平最难掌握，搞不好不是挖“冒”了，就是挖深了。他们每隔一段距离用梭镖在坑道顶上捅个洞，一来可以通风，二来可以通过这个洞测量地表到坑道顶的距离。遇到地面起伏较大的地段，再用水平尺一段一段地测量。

坑道爆破需要大量炸药。直接征集来的黑火药杂质太多，质量难以保证，



以前我父亲用这样的黑火药搞爆破吃过亏，所以要自制黑火药。黑火药的成分是硝占75%，硫黄占10%，木炭占15%。制造炸药需要五千多斤硝，木炭需用杉木烧成。彭总指挥要地方党组织提供所需硝、硫黄和杉木炭。我父亲带了几个工兵制造炸药，征集来的硝杂质太多，我父亲就用家传秘方提纯硝。

制造火药关键的工序是把硝、硫黄、木炭研磨，磨得越细越好。这道工序产生很多极易爆炸的粉尘，是最危险的工序。战士们找了一座庙，把它打扫干净，搬来磨盘。为了防止发生事故，进入庙门时所有人员一律去除身上的武器、金属物品和火柴，非火药制造人员严禁入内。

我父亲他们经过十来天的努力，制造出了六七千斤黑火药，并对黑火药抽样做了爆炸和燃烧实验。

另一道工序是挖药室。药室必须准确地挖在城墙根底下。城墙外层砌的是大块城砖，里面是三合土夯成的，挖起来很困难。他们用会昌战役的办法，在城墙周围挖许多土窖，红军战士在里面不断地打夯，干扰敌人的侦听。每隔一段时间，还用土炮向敌人城楼轰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工兵作业。

三军团工兵连掘的坑道被敌人发现。敌人即以坑道对坑道的办法进行破坏。邓萍参谋长将计就计，组织部队集中火力掩护三军团工兵连的坑道掘进，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我父亲组织工兵在敌城墙根下成功地挖掘了药室。装药时，工兵把两口大棺材用滚木和撬杠推进药室。棺材很重，坑道又矮又窄，工兵费很大力气，才能把棺材推进一点，还没把棺材送到药室，大家浑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几次调换作业人员，才把棺材推到药室里。我父亲和几个干部在两个药室同时装药。他们先把棺材装满黑火药，然后把多余的炸火药码放在棺材和坑道墙壁之间的间隙里。为了保险起见，每个药室里分别装了6个起爆药块，引出了6条导火索。为了防止坑道顶上的土块掉下来压在导火索上，影响起爆，在导火索外面套上竹管。炸药装好后，用沙袋封死药室。

他们撤出坑道后，彭总指挥命令部队进入了攻击位置。我父亲根据彭老总命令，把12根导火索一齐点燃。不一会儿，只见城墙底部冒出一股火光，城墙便被浓烟、尘土包围了。紧接着，大地颤动，传来沉闷的“雷鸣”声。瞬间，城墙出现数丈宽的缺口。红军呐喊着冲进城内。



二等红星奖章

驻在临街店铺的敌人主力，大部分被飞石砸死砸伤。卢兴邦被战士们活捉了。

由于沙县战役功绩，我父亲获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六、高虎恼坑道地雷战

1934年，我父亲到瑞金红军大学任工兵主任教员，不久又担任军委作战科科长兼军委工兵营营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在广昌战役失利，付出巨大代价。我父亲奉命：调查广昌战役失利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经过调查，他认为我军用木板石块构筑的堡垒不足以抗击敌重炮和航弹，建议挖掘坑道和防炮洞作为防御工事。对于武器缺乏的困难，他经过反复思考，建议制造土地雷，实际就是造大鞭炮当武器。他找来毛竹，把它按竹节锯开，挖一个小孔填满黑火药，在小孔上贴一个砸炮当起爆药，埋在地下当地雷。经过试验效果很好，周恩来总政委视察后，命令大力推广。

构筑高虎恼阵地时，我父亲又令构筑工事的老表在阵地前栽一些酸枣树枝和大树杈阻敌进攻。

